

中国中间阶层研究丛书

周晓虹 主编

萌生：1949年前的上海

中产阶级

MENGSHENG

1949 NIAN QIAN DE

SHANGHAI ZHONGCHAN JIEJI

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连连/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中间阶层研究丛书

周晓虹 主编

萌生：1949年前的上海

中产阶级

社会学的考察

连连/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萌生: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级——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连连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0
(中国中间阶层研究丛书)

ISBN 978-7-5000-8250-7

I. 萌… II. 连… III. 中等资产阶级—研究—上海市
IV. 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3066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李玉莲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71
网 址 <http://www.eeph.com.cn>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毫米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330千字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000-8250-7
定 价 4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 序

周晓虹

任何一项研究，从产生研究的灵感或冲动，到收集经验资料，最后到分析、概括和提炼，常常会耗去研究者三年五载的时间，而等到它的出版更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缘此，从事研究的人都懂得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来为自己的单纯或执著解嘲，但事实上，就像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春天撒了种子不去想像秋天收获的农夫一样，每位研究者也无一不期待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早日付梓，因为那里面毕竟凝聚着一个人的心血。

当我写下上面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该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们感到庆幸，因为经过几年的磨砺，从选择中国中间阶层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到完成各自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再经历一次次的修改，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著作终于获得了出版的机会。能够想像，再过几个月，当他们拿到洋溢着油墨清香的样书时，心中会有怎样的激动和宽慰。

其实，我并不是以一个“局外人”或单纯的指导者的心态来写这篇“总序”的。在大多情况下，作为指导教师，除了一般的课程以外，我只需要和我的研究生们拟定他们的论文选题，并对他们的研究方案提些建议，或者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在论文完成以后再给一些修改意见。但对于这套丛书的作者们的研究来说，我涉足的程度却要大得多，因为我不但是这项研究的指导者，也是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还是说具体一些。这项研究始于2002年，直接的动因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约请我担任美国社会学家

莱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的翻译有关，但其更为广阔的背景则是中间阶层在中国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我清楚地记得，在 1990 年代，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自感颇为大胆地预测，20 世纪末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 100 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一进入 21 世纪，一项后来闻名遐迩的研究就指出，中国中间阶层的人数已达到 8000 万人以上；^①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也指出，自 2001 年起的未来 5 年内，中国将有 2 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② 而时任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2001 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 10 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 4 亿。^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我指导的一些博士研究生商议，是否可以将对中国中间阶层的研究作为他们未来的博士论文的选题？获得肯定的答案后，我将由《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的翻译而起的这项研究扩大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前一个部分涉及全球中产阶级的比较研究；后一个部分则涉及中国中间阶层的经验调查。

先谈有关全球中产阶级的比较研究。因为意识到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日益鲜明的时代，任何有关中产阶级甚至社会分层的研究都需要一个鲜明的全球背景，而对这个全球背景的梳理又需要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向度进行，我们这个没有获得什么资助的课

①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4～256 页。

② 《未来五年我国中产阶级人口达两亿》，《信息时报》2001 年 7 月 21 日。

③ 《龙永图大胆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十年内达四亿》，<http://www.chubun.com/2201/12b/gb5/page42-06.htm>。

课题组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几十种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著述,^①其中既包括理论探讨的,又包括经验研究的,既包括历时态分析的,又包括共时态比较的。我记得,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召开一个小型的Seminar,由不同的参与者按不同的主题向大家进行研讨汇报,并引发进一步的讨论。作为这一部分的研究,原本我们预定的成果包括两个部分:(1)在阅读的基础上,大家合力撰写一部《全球中产阶级报告》;(2)从几十种著作中选择10本左右,出版一套能够包括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中产阶级比较研究》的译丛。前一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2005年7月,一本近40万字的《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而后一项工作进行得则不那么顺利,因为原先签订合同的一家出版社未能践约,所以除了米尔斯的那本《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2006年8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外,其余著作包括已经完成翻译的三种至今仍然束之高阁。

再来谈中国中间阶层的经验调查。这项调查和我们现在这套丛书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因为这项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全国五大城市的3038户家庭的电话调查,以及在上述城市及深圳完成的上百个访谈个案,为我的博士生们后来撰写他们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基本的经验资料。其实,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也包括两个部分:(1)运用这些经验资料,大家合力撰写了一本与《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相呼应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2)在此基础上,选择一些重要的领域由学生们各自撰写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些领域包括社会认同、消费行为、休闲方式、社会

^① 应该说明的是,后来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获得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资助,尽管资助金额只有5万元人民币,但对我们的研究还是不无帮助。

交往、教育与文化资本传承、文化品位、政治参与以及传媒接触。另外，考虑到 1949 年前中国中产阶级的萌生，以及台湾省的特殊情况，我还特别安排了具有历史学背景的连连和来自台湾的胡正文对 1949 年前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台湾的中产阶级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比较而言，前一部分的成果完成起来压力不大，加之又有我的直接“督阵”（其实背后“督阵”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社长谢寿光），很快也完成了。2005 年 8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005 年 9 月 2 日，经发行量数百万份的《中国青年报》一整版的报道，一时间，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调查及其讨论成为海内外诸多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仅仅 20 天后，经网络检索，Google 网站能够检索到与《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相关的网页达 75,400，Baidu 网站也高达 39,700。但后一部分的成果完成起来的压力则要大得多，因为毕竟是博士学位论文，它要求将每一个人原先撰写《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时涉及的主题扩展开来，对原先的经验资料进行较为深入的学理分析，这对一个人的学术功力不能不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自己也写过博士论文，现在也指导了一些学生写博士论文，谈到体会，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种蓬头垢面、身心憔悴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好在对我们这个课题组来说，大多数同学都已经陆续摆脱了那种“梦魇”般的日子，单单这一点就值得好好庆贺。

我觉得还有必要交代的是，在上述这份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全国五大城市的 3038 户家庭的电话调查写成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中，我们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的综合考察，得出中国五大城市中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的有效百分比为 11.9%。和先前其他一些学者完成的有关中国中间阶层的研究一样，就是这个还算保守的 11.9%，也还是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许多人不相信中国的大城市

已经有了 11.9% 的中间阶层（当然，因为没有仔细看书，误认为我们的调查范围是整个中国大陆的则另当别论），也有许多人不相信，月收入 5000 元人民币以上、白领职业、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就能算中间阶层。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因我们的《调查》而写成的文章，这位月收入 7000 元的白领将自己的收支列了一张清单，除去商品房的月供、子女的教育、汽车费用、生活费用等项以外所剩不多，于是十分委屈地抱怨：“我也能算是中产阶层？”

2005 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后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演里，我都分析过在改革开放 25 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的同时，为什么国人还是会对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间阶层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和印度人的自信恰成对照。2005 年 11 月，我在印度孟买三星级的 Heritage Hotel 附设的小咖啡馆里和经理有过一段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对话。他不但坦承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还用自得的神情反问我，“你不知道么？印度是中产阶级国家”。有意思的是，那位经理告诉我的印度中产阶级的收入下限也是 5000 元，不过不是 5000 元人民币，而是 5000 卢比，也就是 1000 元左右的人民币。我觉得中国人所以会对当今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间阶层持怀疑态度，原因之一在于对英文 middle class 的误读。类似的现象其实如萧新煌教授所说，也曾出现在台湾和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广泛使用英文的香港特区和新加坡，“中产阶级”一词直接对应于特定的人口，一般不会引起过多的歧义，因此，“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和“专业人士”（professional）两个术语的混用都很流行；但在台湾省和韩国，middle class 的中译和韩译都包括了“中等财产”的含义，因此，像米尔斯那样直接将专业人员或白领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的做法就遇到了相当的障碍。在中国

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 middle class 的习惯译法都是“中产阶级”，它自然会强化人们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而忽视现代中间阶层或者说新中间阶层的职业特征。

造成人们怀疑的第二个原因可能与对中间阶层的收入及其社会属性的高估有关。在收入或经济地位方面，因为毛泽东曾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所谓 petty bourgeoisie）划为中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间阶层的财产和地位标准。其实，即使在美国，无论是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也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多，所以，米尔斯在《白领》中会直截了当地说：“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即使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年收入也不过在 2 万 ~ 7.5 万美元之间。至于社会属性的高估则和人们对中间阶层的社会期待过高有关。在一篇题为《“中产阶级”概念被误读，高收入不等于高素质》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写道：“对个体而言，中产阶层则绝不意味着享受与奢华，而是意味着责任与付出。……中产阶层之所以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阶层，正是因为该阶层有了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面对这样的文字，再看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细细感受老中产阶级的没落和新中产阶级在美国的兴起，和“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的经典描述，其实很容易知道，在中国有多少人误读了中间阶层，而这种误读是导致他们否认自己是中间阶层的重要原因。

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我和我的学生们花这样多的时间去研究中国中间阶层是值得的。我在以前的一些文章里指出，在中国，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工业化或现代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地方），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力量是在 1978 年后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影响或作用的。

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农业社会继续向工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使得中国中间阶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成为可能。从这样的角度说，中间阶层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丰硕成果，或者说是一道独特的社会分层景观。如果我们认定社会学家或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不能不关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出现的林林总总的变化或现象，那么研究中国中间阶层的发生、发展和困境和我们对中国社会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其他阶层的研究一样，都具有连城之价，起码它记录了现在这个大时代中国社会的独特经历。

最后，在这篇序言里，我想重复我最近在一些文章中谈及的一个主题，即中间阶层的作为或者作用。中间阶层是工业社会的产儿，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象征，它能够带来社会的富裕和稳定，以致许多人都以为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所谓“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但中间阶层不是罗宾汉式的英雄，它的出现和成长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全部问题。虽然我承认，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为中间阶层的成长腾出了足够的空间，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中间阶层的成长不仅步履维艰，甚至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不均、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以及中间阶层及其相关研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等一系列问题的话，年轻的中国中间阶层也许还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公或社会失范的“替罪羊”。从早几年就出现的对机关公务人员的不满，到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对包括医生、法官、律师甚至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士或标准的“新中间阶层”的诟病，说明我们的担忧并不是一种凭空的臆想。所以，我希望我和我的学生们在中间阶层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不但能够促进中国中间阶层的成长，同时也能够使更多的人更为全面而正确地理解中间阶层。

显然，在一个包括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和谐相处的社会中，中间阶层才有可能获得健康成长的空间，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才有可能过上丰裕而有意义的生活。是为序。

2007 年春节

目 录

总序/周晓虹	(1)
第一章 导 论	(1)
一、选题论证与研究主题	(1)
二、理论概述与分析框架	(5)
三、研究方法与本土实践	(28)
四、文献研究与资料综述	(41)
第二章 与上海一起成长	(52)
一、上海的成长——一座城市发展的独特模式	(53)
二、乡下人·外地人——上海人	(65)
三、上海中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78)
第三章 新式职业与中产阶级	(96)
一、职业——上海中产阶级的孵化器	(97)
二、职业需求与职业收入	(122)
三、职业与社会分层	(150)
第四章 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	(185)
一、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	(186)
二、中产阶级与学校教育	(199)
三、职业获取与文化资本	(217)
第五章 中产阶级的社会资本	(249)
一、社会资本概念	(249)
二、家庭关系与职业	(254)
三、同乡关系与职业	(259)
四、个人关系及职业团体、学术团体的作用	(272)

五、职业与社会流动	(286)
第六章 中产阶级的群体特征	(303)
一、现代科层制度与中产阶级	(304)
二、职业化的知识阶层	(324)
第七章 生活方式与消费特征	(336)
一、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	(337)
二、以西化生活为导向的时尚娱乐消费	(358)
三、中产阶级的文化消费特征	(371)
第八章 危机中的中产阶级	(388)
一、中产阶级的政治潜能	(389)
二、中产阶级与社会变革	(400)
结 语	(423)
参考文献	(431)
一、档案、文献资料	(431)
二、论著	(438)
三、论文	(449)
四、英文参考文献	(453)
后 记	(455)

第一章 导 论

一、选题论证与研究主题

在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世界性革命进程中，中产阶级作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产物，已成为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普遍现象。从欧美的“原生型”模式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生型”模式，各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道路既表明了发生学意义上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及其规律，同时又深刻地显示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国家中产阶级成长的独特个性与风貌。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推动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日渐深入，最终导致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由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外企白领、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新兴技术行业的高收入者及自由职业者所构成的中产阶级群体的悄然崛起，不仅使中国中产阶级获得重生，^① 而且以其迅速成长之势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在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中产阶级的概念及

^① 参见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第 39—40 页。

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中产阶级的定义和特征,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发展等均成为热点问题。与此相关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国内学者在阶层与群体利益、群体与个人、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一元标准与多元标准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突破。国外学者则着重于市场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阶层变化及其中的社会公平问题。例如倪志伟的市场权力、市场刺激与市场机会三论题;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继续论”;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论;魏昂德的“政府亦即厂商”说以及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论点等。有关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的讨论,进入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主流领域,为前所罕见,亦表明了该研究的意义非同一般。^①对中产阶级及社会分层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凸显的是一种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价值肯定以及对中国社会结构趋于更合理更稳定的关注与期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基本上集中于当代中产阶级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历史上同样具有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关注。至今为止,国内外有关 20 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成果稀少,与具有丰厚积累的上海学研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二是既有的研究成果多为局部或零散的研究,有关 20 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级的整体性研究至今尚未出现,对中产阶级与上海社会转型的内在关系更无专门的探讨;三是现有的 20 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级研究采用的多为历史学研究方法,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此课题作总体考察的成

^① 1. 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2. 李强、邓建伟:《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演进》,《学海》2002 年第 4 期,第 83 页。

果仍是空白。^①

选择 1949 年前的上海中产阶级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上海现代化的产生、发展及社会转型以其独特的复杂性和艰难性，集中体现了后发生型现代化的典型特征。虽然其社会转型至 1949 年并未真正完成，但就其现代性而言，上海在中国仍具有最为成熟和特殊的个案意义。上海中产阶级无论从发生、构成、规模还是发育程度、表现特征等方面都具有最为突出的代表性。自上海进入 20 世纪，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有关上海的研究，就持续不断地吸引着中外众多的学者。但在繁荣的上海史研究中，中产阶级作为一个人数已达数十万（20 万—30 万）之众的社会阶层，其面目和群体特征依旧模糊不清。而事实上，作为上海市民一支重要力量的中产阶级，其本身的萌生、发展及其特征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社会转型以及上海市民性格的形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其研究的缺乏使上海史研究至今仍是不完整的和有缺损的，上海现代化进程和 20 世纪上海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也就不能得到全面的

① 上海中产阶级研究的相关论著主要有：1. Wen - hsin Yeh, "Corporate Space, Communal Time: 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s Bank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1 (Feb. 1995). 2. Wen - hsin Yeh, *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es: 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Weekly, 1926 - 1945*,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 - 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92. 3. Xiaoqun Xu,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 - 1937*,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Ling - ling Lien, *Searching for the New Womanhood: Career Women in Shanghai, 1912 - 1945*.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01. 5. 岩间一弘：《1940 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史林》2003 年第 4 期。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1919—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部分内容有所论及的有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揭示和说明。虽然 1949 年革命的成功及其之后的社会制度变革，割断了当代中产阶级与早期中产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就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而言，20 世纪早期上海中产阶级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弥补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历史空缺，使今天的相关研究建立在一种对历史变迁的宏观把握与历史经验的多重观照之下，而且还在于当今长三角地区经济迅猛发展，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并推动着该地区“橄榄型”社会结构初现之时，为我们认识和把握该地区社会结构包括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变化提供一种历史比较的深刻认知及其有益借鉴。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有关 20 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级（以新中产阶级为研究重点）的萌生及其与社会转型内在关系的探讨。萌生一词在此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海中产阶级产生这一动态的过程；二是指上海中产阶级尚处于未发育完善的初始状况和初始时期。首先，研究将以近代上海在外力冲击之下开埠后出现的社会急剧变化为背景，从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特殊性来描述和分析上海中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特点。通过传统与现代不同社会类型的比较以及东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对比，对上海新老中产阶级产生、发展的独特性以及新老中产阶级同时发展这一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的发展模式予以说明。其次，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分工促成了各种新兴职业产生这一认识入手，考察中产阶级萌生的总体状况，探讨职业和职业地位在中产阶级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并揭示这种新的社会分层是如何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和开放，从而形成新的多元社会结构，影响着上海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此，通过以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资本和以社会关系、个人能力、规范信任为内容的社会资本以及组织制度因素，作为分析和解释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概念，进一步说明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变化进程中所表现